

火线办学的胶东公学

□张荣起

抗日战争初期,在胶东火线上办学,在创办时间之早、学校规格之高、流动办学时间之长、学校住址转移之广、培养党政军干部之多等方面,堪与胶东抗大相匹的,唯有胶东公学。所不同的是,胶东抗大有武器装备,具备战斗力,而胶东公学虽也有少量手榴弹护身,但基本是文职学员,擅长宣传工作。在残酷的战争年代,这两所学校如同扎在敌人心脏里的两把尖刀,被日军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时时刻刻都想把她们扼杀在摇篮里。这里所说的,是胶东公学在火线上办学的故事。

时局决定“立分迁合”的办学格局

1938年8月,胶东特委仿延安陕北公学的模式,在原黄县中学校址成立胶东公学,曹漫之(时任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、黄县县长)兼任校长,赵野民任副校长,阮志刚任教导主任。学校分设社会(培养干部)、师范(培养教师)、普通(类同中学生)三科。首期招生250名。教师有王卓青、罗竹风、苏振民、李同家、孙步唐、李希琪、张秀珩、于大申等。学校实行供给制,师生吃饭穿衣(分冬夏两季)皆由学校统一配备,每人每月发给一元钱的津贴,教师略有增加。由于战争频仍,不久,胶东公学撤出黄县县城,开始了流动式办学。

1939年2月,掖县、黄县县城先后被日寇占领。在严峻的形势下,为保存有生力量,胶东公学退驻山区,途中奉命与随三军西迁的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合并。1940年5月,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,根据北海会议决议和中共山东第三区委指示,战时建立的蓬黄联中,与招掖联中被撤销,恢复更适应抗战形势的胶东公学,委派赵野民任校长,王纯任指导科长,迟建民任教学科长,教师又增加了王慕韩、邓斌三等人,校部移往掖县西由一带。为了加大办学力度,扩大招生和培养干部的数量,学校派指导科长王纯率领教职员10余人,到栖霞与黄县交界处的艾崮山区开办胶东公学北海分班(俗称栖霞分校,校址在林家村)。两处分别招生,掖县招生五十名,栖霞招生七十余名,均借用民房为校舍,上课与住宿兼用,以随身行李包为桌椅,以膝盖为课桌,在与敌人的周旋中,采用流动而隐蔽式的教学。虽然条件简陋,生活极其艰苦,但大家情绪高昂,学习热情高涨。

1941年5月,栖霞分校突遭敌人袭击,师生遭到摧残,一度停止教学活动。夏秋间,胶东公学总部奉命从掖县西由一带转移到栖霞西北部的蒲泊村,与栖霞分校师生汇合,短暂整顿后秘密东进,经牟海等诸县,在凤凰崖、涝口一带,继续招生,学生增至300人,教师也不断增加。1942年,为反“扫荡”,学校迂回迁移,曾安顿在青山、垛山(今乳山境内)一带的村庄。在日伪军拉网式大“扫荡”中,有不少师生不幸遇难。转移途中,学校还一度与胶东女中(创建于1941年)合并。下半年形势更加严峻,胶东公学继续东迁,迂回乳山冯家,涉老母猪河,最远到达文登、荣成一带。校本部在双石徐家落脚,400多名师生疏散到周边几十个村庄老百姓家里,依靠群众的支持与配合,历经两个多月,终于取得了反“扫荡”的最后胜利。

1943年元旦过后,胶东公学顺原路返回,汇集于今乳山(时称牟海)境内的珠塘、烟岭、徐家、官家、洋村、南口村一带,校部住徐家,师生辐射周边五六十里的村庄,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的敌后教学工作。是年3月,增设了高中班,学生数量增至600人。学校领导及早教师阵容强大,不少来自清华、北大等高校。校长李芸生兼指导处主任,副校长赵野民兼教务主任。这期间广泛深入的节目娱乐教育驻地群众,还为战争年代的乡村播下了红色的种子。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,铜岭小学一度成为胶东公学的附属小学,师生增至千余人,时间虽不太长,但在很多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

深深的烙印。胶东公学在乳山沿海一带办学的意义及影响极其深远,至今在黄海岸边的白沙滩镇官家村保留遗址,并建起了胶东公学纪念馆。

1944年秋,胶东公学正在学习延安精神、开展大生产运动,忽然接到上级指令,高年级学生立即毕业分配。学生大部分从政,有的从军,或到公安、群众团体等部门工作。与此同时,根据上级指示,胶东公学向西转移到海阳县高村一带,与海阳中学合并,合并后共有18个班、学生900多人。1945年上半年,上级动员全校师生参军参战,参加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,学校暂时停办。

发生在栖霞的一次惨案

胶东公学栖霞分校所在的林家村(今属苏家店镇),位居艾山南麓,被丛山绿荫怀抱,十分隐蔽。1938年秋,以刘维和为首的栖霞抗日行政办事处在这里成立,1940年4月24日,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。姜若任县长,孙加诺任县委书记。因此,这一带的党组织健全,群众基础好。蓬黄战区指挥部及胶东军区的兵工厂、被服厂等,也相继迁往附近的前寨、后寨等村。胶东公学在此设立分校,也很符合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转移策略。

胶东公学确定校址后,师生立即投入教学工作,加大防御敌人破坏与渗透方面的教育与训练,战时的形势与策略教育更被视为重中之重。不料,他们的活动情报被驻招远据点的日伪军刺探到,引发了一场血洗胶东公学的罪恶行径。

1941年5月19日清晨,学生刚上完早操,撤回设在村北口的岗哨,集中到教室里开始上早自习。一个在村西头站岗的学生急匆匆地跑回来,向中队队长陈顺卿老师报告:“有一路身份不明的队伍在村西泥冢子架起了机枪,村里也发现了形迹可疑的人。我避开他们的视线,绕道跑回来报告。”陈顺卿正在琢磨,忽然从村里传来一阵枪声,他立即下令:“不要紧张,听我指挥,立即向村外转移……”

这枪声是冲着语文老师杨铁刀放的。当时杨老师正在另一处民房备课,突然跑进一个少年,低声说:“14团来了,个个头戴钢盔。”杨老师寻思,八路军14团、13团是我党在胶东的抗日主力部队,不会在这时候出现在大街上,也没有钢盔的装备,便快速将语文教材用包袱包好,扎在腰间,摸起日常使用的拐棍离开了屋子。他的脚刚刚迈出街门,便遇上了两个见人就叫五喝六的日本人。杨老师机智地来了一句:“你们有本事去对付八路军去,对自己人要什么威风!”两个日本兵先是一愣,以为是遇上了日本潜伏的文职人员,但又心存疑惑。杨老师不慌不忙地解下身上的包袱连同拐棍递给日兵,说:“是给你们准备的!”当日本兵分头接包袱、拐棍之际,杨老师一个闪身拐进了熟悉的胡同,很快失去了踪影。两个日本兵缓过神来,“砰砰砰”放起枪来,打破了山村清晨的寂静。

就是这阵枪声,让大家警惕起来。在陈顺卿的指挥下,大家悄无声息,猫身沿着熟悉的僻静小巷,直奔村东南的凤凰沟。不料,村西泥冢子的日军发现了师生们突围的踪迹,于是机枪、步枪疯狂地向他们的方向狂扫乱射,不断有学生发出中弹后的惨叫声。其余人见危险临近,选择卧倒在地以求自保。陈顺卿本能地

意识到,如果冲不出敌人的射击圈,就有当俘虏的危险。他再次高喊:“同学们,不要卧倒,要快速离开射击区!”骚乱中,醒悟的同学们飞速疾驰,穿越了凤凰沟,消失在深山丛林中。

日本兵发现师生逃出包围圈,气急败坏,在村里村外逐屋逐沟地进行地毯式搜索。其间,有两名女生因腿软跃出凤凰沟,隐蔽在低洼深处,被日军捉住活活刺死。

此时,胶东公学的司务长还在街上。他留着时兴的分头,日本兵一见便心生怀疑,马上抓捕并严刑拷打。幸有一位50岁上下的村民上前求告:“他是我的儿子,在烟台做买卖,刚回家。”旁边的老奶奶老泪横流,也说这是她的孙子。日本兵信以为真,司务长这才死里逃生。

另一位年轻教师在逃生的路上被日本兵抓住了。日本兵问他:“八路的兵工厂和指挥所在哪里?”老师回答:“不知道!”日本兵举枪要打,他勇敢地抱住了枪,破口大骂:“你们日本人侵略中国,杀害中国人,罪恶滔天,我不会告诉你们!”恼羞成怒的日本兵把他推进松柴垛,点火焚烧。在熊熊烈火中,他高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,英勇殉国了。

沉云笼罩着艾崮山区。王纯校长由专署开会返校,行至蒲泊村时,听到日军血洗胶东公学的悲惨消息,心如火烧,立即组织群众寻找被打散的师生,汇集到蒲泊村进行安顿,并把受重伤的师生送到龙口医院治疗。据统计,此次惨案共有8名师生遇难,10多人受伤,致残数人。惨案给师生留下的精神伤害一时难平,分校决定,暂缓集结授课。

直到8月,胶东公学总部奉命从掖县西由赶来蒲泊村,才将师生汇集起来,一起东迁。

学子遍布胶东各校

1945年日本投降后,胶东行署决定在莱阳中学的基础上恢复胶东公学。11月26日,胶东公学在莱阳南村(今属山前店镇)举行复学典礼,姜守迁任校长。

此后学校的办学空间不断扩大。1946年3月,胶东公学部分师生徒步两日进入烟台,与东山中学(原芝罘中学)和烟台师范合并为“山东省立胶东公学总校”,姜守迁任校长,王本贤任副校长,共有21个班、学生1109人。留守莱阳的胶东公学被命名为胶东公学莱阳分校,胶东公学此时已达到鼎盛时期,同时师生的校徽正是这时定制的。1946年暑假,以胶东公学师范部为基础,组建胶东师范学校,简称“胶师”,“胶师”校徽由此始用。笔者1951年就读莱阳师范时,在校学生的“胶师”校徽还未更换,所以胶东师范学校与胶东公学是一脉相承的。

1947年夏秋,国民党军进攻胶东解放区,胶东各中学疏散备战,胶东公学总校从烟台市撤出,转移到福山县的集贤村坚持学习,同时动员了一部分师生参军参战。不久,胶东公学与撤出的烟台一中、二中合并,建立了烟台联合中学。至此,历经近十年的胶东公学结束了历史使命。它先后为党、政、军、群部门输送人才6000余人,在胶东地区的办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

烟台所城的民俗根魂

□刘萍

所城的青砖说尽故事。老烟台人常说,所城的每一块青砖,都藏着说不尽的故事。这片占地约9.86万平方米的土地,镌刻着600余年的岁月沧桑——明洪武三十一年(1398年)设立奇山守御千户所,夯土筑墙,戍守海疆;清顺治十六年(1659年)卫所裁撤,军户解甲归田,自此卸下戎装,扎根城下,晒鱼干、种地瓜、开商埠,繁衍生息。

当年城墙高7.33米、厚6.67米,设东保德、西宣化、南福祿、北朝宗四个门,如今虽規制不再,然风骨犹存。20余代烟台人,在这方天地里,将军旅余韵与市井烟火相融,酿出了生活最醇厚的滋味。

胶东的民俗风情、匠人的非遗技艺、街巷的人间烟火,层层叠叠地融进青砖灰瓦的肌理之中,沉淀为这座城市最深沉的文化记忆,更成为游子漂泊天涯、魂牵梦萦、无法割舍的乡愁根脉。正所谓“一座所城里,半部烟台史”,这里自始至终都是烟台的根脉所系。

历经600余年的风雨洗礼,如今的所城正焕发出生机,骨子里的古韵从未遗失。老院落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,复原了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四合院,青瓦覆顶、红柱雕檐,古意盎然;青石板路被岁月与脚步打磨得温润如玉,藏在青砖灰瓦里的文脉,从未因时代更迭而断流,反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醇厚,化作流淌在城市血脉里的文化基因,生生不息。

窗棂上,红彤彤的剪纸栩栩如生,喜鹊登梅、连年有余、福寿双全,皆是民间巧手以剪刀为笔、细针为刀,剪的是吉祥祥瑞,寄托的是胶东人对美好生活的质朴向往。清明面塑,代代相传。清明时节,控制面塑的习俗代代相传。巧手匠人以温熟面团为材料,捏出单头燕、双头燕、展翅燕、子母燕等灵动造型,煮熟后以柳条或红绳串

起,悬挂于门楣。老辈人说,这是盼春归、引燕来,祈愿阖家安康、岁岁平安。这些流传百年的老讲究、老习俗,没有华丽的包装,却靠着老一辈人的口传心授、亲手制作,完整保留至今,不曾褪色、不曾走样。每一道工序、每一个仪式,都藏着胶东人对岁月的敬畏、对生活的热忱,是刻在民俗里的温情传承。

所城的滋味,是刻在烟台人味蕾上的乡愁密码。烟台烟子,这道最接地气的胶东小吃,藏着所城独有的烟火故事。其起源流传最广的说法,是清末门姓兄弟在烟台街经营粉条时,因遭遇大雨,兄弟俩怕粉条受潮变质,情急之下将粉条下锅熬熟切块,意外成就了这道美味,又因油煎烟制之法,得名“烟子”。更久远的说法则与明初戍边有关:冬日天寒,军户家眷以本地地瓜磨成淀粉,加水熬制成冻,切块煎熟,为守城将士果腹御寒,简单食材中藏着最质朴的牵挂。

岁月流转,这道平民小吃在传承中愈发精致。正宗的烟台烟子,以纯地瓜淀粉为原料,制成粉胚后切成方丁,小火慢煎至外皮焦黄透亮,内里软糯弹滑,淋上芝麻酱、蒜泥、虾油,再来一勺陈醋点睛,酸香鲜醇,层次十足。老烟台人吃烟子从不任意摆盘,多是站在街边小摊前,一手端碗,一手持筷,趁热戳着吃,即便烫得咧嘴也舍不得停口。一吃下肚,满是儿时滋味、故乡气息,街巷里不绝于耳的滋滋煎响,便是所城最鲜活的烟火气。

所城的匠心,藏在市井街巷里。如今的所城已是活态非遗社区,依托院落格局,集聚剪纸、绒绣、锡艺、葫芦雕刻、传统盘扣、胶东彩塑等十余项非遗,形成“非遗展览+体验工坊+传承课堂”的传承空间,每一门老手艺都是时光淬炼的瑰宝。

烟台剪纸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,风格兼具粗犷大气与细腻精巧,线条流畅,层次分明。剪刀起落间,山海风光、民俗百态、花鸟鱼虫跃然纸上,将胶东风情尽显呈现。

烟台绒绣又称毛线绣,是中西工艺交融的典范。1886年,烟台刺绣高手董泰以西式网眼布、绒线为材,结合方点针法,绣出第一幅绒绣作品《王后出巡图》。历经传承,绒绣针法从原始的斜针发展为乱针、十字针、扒针、

掺针、拉毛等60余种,作品色彩丰富、层次分明、立体感强,兼具西方油画写实之韵,又有东方书画写意之神,一针一线皆是匠人初心。

胶东锡艺素有“没有金刚钻,别揽瓷器活”的俗语。匠人以金刚钻精准开孔,以锯钉缀合残瓷,化残缺为完整,既修复器物,更传承惜物守心的生活智慧。此外,精巧的葫芦雕刻、雅致的传统盘扣、憨朴的胶东彩塑,亦在方寸之间尽显匠心。老匠人守桌静坐,游人驻足体验;孩童围旁学艺,老手艺就在烟火气与言传身教中代代相传。

青砖不语,文脉有声;绝技永续,乡愁绵长。从昔日海防要塞,到如今的历史文化街区,时代更迭,所城面貌日新,刻在骨子里的文化根魂却从未散去。非遗工坊里匠心坚守,街边小摊前烟子飘香,深巷老墙下“小闹宁”“儿郎”的呼唤,“饭吃了没”的乡音,是跨越代际的情感纽带,是最动人的乡土告白。

漫步所城,青石板路平整舒展,老院落古色古香,青砖黛瓦诉说过往,烟火气息温暖当下。这里不仅是烟台600余年历史的见证者,更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原乡与文化根脉。



(资料图 申吉忠/摄)



在招远市辛庄镇东庄子村,一方篆刻着《金鼎志》的石碑静静伫立。碑上的文字不仅记录着一口水井的由来,更承载着赵氏父子两代人爱国爱乡、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,成为浸润乡梓、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。

碑主赵金鼎(1884年—1947年),是东庄子村家喻户晓的先贤,更是招远早期抗日斗争的先驱。他早年毕业于招远师范学校,青年时赴北平经商,中年后归乡务农,本可安度晚年,却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。1937年“七事变”爆发,山河破碎、生灵涂炭,时年53岁的赵金鼎以半百之躯勇赴国难,于当年冬天牵头组建了招远县第一支地方抗日武装——望儿山坡抗日救国团,点燃了当地抗日救亡的烽火。1938年,这支队伍先后改编为招远县抗日游击队第三十二大队、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后方司令部独立二营,成为胶东抗日战场上的重要力量。同年春,赵金鼎还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招远县七区负责人,为动员群众、支援抗战奔走不休,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,直至1947年离世。

赵金鼎的爱国精神,在其子赵天民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传承。赵天民生于1925年,自幼受父亲庭训熏陶,胸怀报国大志,刚满20岁便投身革命,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3年参加八路军,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驰骋疆场,屡建功勋。1949年,他随军南下,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;1958年他转业回北,扎根地方建设,官至副厅级,始终坚守着共产党人的本色。

岁月流转,赵天民虽身居异乡、年登耄耋,却始终情系桑梓。他感念家乡父老饮水困难,毅然慷慨解囊,捐建水井一座,并以父亲赵金鼎的名字命名。这方水井,一头连着民生,一头连着家风;既为乡亲们解决了饮水难题,造福一方;更将赵金鼎的爱国爱民精神镌刻在故土之上,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,善举昭昭,泽被后世。

2008年5月,水井修缮之日,东庄子村村委会特立此碑,勒石为记,永志不忘。碑上的每一个字,都是对赵氏父子家国情怀的最高礼赞;井中的每一滴水,都浸润着东庄子村的文脉与乡情。如今,这方水井与清泉,早已成为东庄子村的精神坐标,诉说着一段跨越百年的家国故事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红色基因、厚植桑梓情怀,让爱国爱乡的家风如清泉般源远流长。

以前在大集体的时候,人们除了过年过节、来客人的时候,或者驻点、下乡干部来吃饭的时候会炒菜外,其余时间一般都是蒸菜吃。家家户都会去供销社买个砂大碗,把菜切碎放进碗里,加油、盐放锅里煮熟。吃饭的时候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地夹着菜,吃得津津有味。

生产队给每家每户分一个小菜园,一年四季,菜园里长什么菜就蒸什么菜吃。春天刚开始的时候,蒸冬天储藏的大白菜、萝卜,偶尔也会上山挖点荠菜蒸着吃;等到红根菠菜长大了,就开始蒸红根菠菜。夏天,菜的花样就多了,韭菜、大葱、茼蒿、土豆、茄子、芸豆、羊肠豆角等,都可以蒸着吃。秋天虽是收获的季节,但是菜园里菜的花样并不多,可以蒸着吃的也就茄子和扁豆。冬天下,大白菜、萝卜当家。四季中,蒸菜离不开咸菜,也就是腌的萝卜。萝卜产量高,特别是一种外号叫“瞎八斤”的萝卜,一个就能长七八斤,一亩地能收获七八千斤。生产队分完萝卜,家家户都会腌一两缸。萝卜腌好了,切片或切丝晒干,蒸熟了红红的,色香味俱全。

村里有个供销社,一年到头卖虾酱。虾酱全是成盐渣,用它来蒸菜,既省了买盐的钱,又能尝到虾的味道。人们把虾酱买回家后,放在小泥坛里,盖着盖子,时间久了也不会坏。蒸虾酱的时候,先切一大碗白菜或萝卜条,用筷子夹一点虾酱放进去,蒸熟后满碗都是虾酱的味道,很鲜美。生活条件好的人家,会在虾酱里打个鸡蛋或鸭蛋,蒸熟后不仅味道鲜美,而且有营养。

我那时特别喜欢蒸的虾酱。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家,看到锅上有一碗虾酱,拿起一块冷玉米饼子就蘸着虾酱吃了起来。母亲去房子东面的草垛拿草回家烧火做饭,看虾酱少了,冷的玉米饼子也少了,就问我,我说是我吃了。母亲有些无奈,那虾酱是生的,还没有烧火煮熟。后来,我在栖霞十中住校时,母亲知道我爱吃虾酱,就经常用玻璃瓶子装满蒸的虾酱托人捎给我。

蒸咸鱼片也是我记得深处的一道美味。夏天的时候,菜园里的茄子长得提里当啷的,这一茬还没吃完,下一茬就长大了,而且个个长得肥大丰盈,很漂亮。买一条咸鱼,用刀剁成一段段的,分三次和着茄子蒸。乡里有“刀鱼头,鲛鱼尾”的说法,形容刀鱼头和鲛鱼尾的味道鲜美,但对于咸鱼来说,不论是头还是尾,都是鲜美的。而茄子最能勾出那种鲜美的味道,蒸熟后茄子里也全是鱼的味道,吃一口满嘴留香,别提多馋人了。

蒸菜也能看出一个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。夏收和秋收是农忙季节,饭要在地里吃。早晚、午饭的时候,生产队派人回村里去收饭,用两个大篮子盛着,挑到田间地头,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吃。家庭条件好的蒸的是小鱼干,供销社卖一毛钱一斤,有时是一毛二分钱一斤。小鱼干蒸熟了散发着诱人的香味,咬一口玉米饼子,再咬一口小鱼干,香味十足。还有的人家在蒸的韭菜、大葱里打上一个鸭蛋或鸡蛋,这也是“优等户”才能吃得起的。大部分家庭的蒸菜里只有蔬菜和虾酱。

吃蒸菜也是为了节省花生油。那时物资贫乏,家家户户都要精打细算,不能寅吃卯粮。秋收结束后,各个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,按照人口分带壳的花生,供大家换油吃。我们村的地比较多,花生的产量高,一般人均能分十二三斤。有的村地少,人均只能分十斤。一斤带壳的花生能出七两花生米,花生米饱满的,一斤能换四两二的油,瘪的花生米最多能换四两油,一户人家分到的花生,换了多少花生油,必须省着吃。村里有一户人家,过日子特别节俭,女主人蒸菜时,先在菜里加水,再用筷子蜻蜓点水一样地蘸一下花生油,然后在菜碗里一点,这样点三四回,就算是加了油了。到了年尾,把花生油上秤一称,一两也没有少,原来她把菜里的水带回了油坛里。

自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家家户户每年都去油坊换七八十斤花生油,有的人家甚至能换一百多斤,于是大家开始炒菜吃,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顿顿蒸菜吃了。炒菜吃多了,我有时会想起蒸菜的味道,让妻子蒸汤白菜吃。

蒸菜,是那个年代乡村平凡而又简单的生活方式,它温暖了那个物质贫乏的岁月。

金鼎井下的家国情怀

□曹景广

蒸菜

□王永青